

观察台

吊在半空11天的人

本报记者 李斐然

如果你在“五一”放假前，路过北京的陶然亭，或许能碰到一个住在塔吊上的人。在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，沿着正在施工的高楼一直仰头向上看，有一个模糊的黑色身影站在高达70米的黄色塔吊车顶端，像偌大的雪白宣纸上溅上了一滴黑色墨汁，嵌在天空的背景里。

没人知道是谁第一个发现他，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拨打了求救电话。正在施工的工地突然陷入安静，混凝土搅拌机中断了工作，大货车停在了路边，这个人占据了高高的塔吊车，站在70米的高空，让周围的一切因他而暂停。

伴着轰鸣的警车，仰头看热闹的路人也凑了过来。人们不知道他的身世背景，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，街坊邻居说起来，都只能叫他“那个人”。

在叽叽喳喳的讨论声中，负责救援的派出所民警和消防队员也抵达现场，从望远镜里看了一眼塔吊上的人，他们便立刻认了出来——唉，那个人又来了。

这不是救援人员第一次见到爬塔吊的男人了。在他们眼中，他是个出名的上访专业户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他上访过许多次，一次比一次动静大。上一次见到他，他也爬上了高高的塔吊，要求政府给他解决问题，待了几个小时后，他如愿以偿。

这一次，他又来了。浙江老家的征地问题让他很不满意，于是，这个曾经在工地开过塔吊车的男人带着保暖的外套和一大袋子口粮，溜进了陶然亭的一处工地——一个离信访局很近的工地——爬上塔吊，想再次闹出点动静。

在飘着雾的下午，救援人员费了好大工夫爬上了塔顶，身上绑着绳索，小心翼翼地向他移动，在隔着近5米的地方跟他喊话，劝他以自己安全为重，尽快下来。

在远远拍下来的视频里，这个50多岁的男人着急地挥舞着手臂让他们离开。他不说话，其实在那样的高度，说话也没人听得到。他默默地坐在塔吊顶，不肯下去。

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在那些日子路过这里，更大的可能性是，你压根儿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。在这个人声嘈杂的街头，私家车在拥堵的路口喇叭地摁着喇叭，一大早开工做生意的大排档伙计急匆匆地从店里扔出一袋袋垃圾，喷着水的洒水车缓缓地在路边爬行，试图拯救尘土和柳絮弥漫的空气。

在这个人和世界之间，展开了一场沉默的拉锯战。他裹着厚厚的外套，坐在塔吊上不肯下来，救援人员在隔壁高楼顶上支起帐篷，仰头看着他，保护他的安全。他们之间甚至产生了莫名的默契。每天中午，他从70米之上抛下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绳子，守着他的救援人员就跌跌在绳子末端的钩子上挂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火腿肠、面包，还有怕他上火的凉茶，给他补充体力的红牛饮料。

塔吊上的人待过了第一天……第二天……一直到待到了第十天……流言以光速在地面上飞驰。在中午买菜路上，街坊邻居会聚在路口，聊聊这件事，他们之中甚至有自称大学法学教授的人站出来，消防员得守在他这儿，那些真遭了火灾需要救援的人怎么办？

没人再仰头看他，人们在街口激烈地争辩起来。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之外，只有一个大妈走到看门的保安面前，问他：“昨天晚上下那么大的雨，他一个人待在上面多难受啊，还是想想办法让他下来吧。”

不过，身在70米之上的男人却听不到地面上的这些争吵。事实上，站在地面上的人们并不能清楚地看到他。摄影师爬上隔壁20层的楼顶，用高倍镜头望着他，迎着落日余晖，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塔吊车的钢筋上，大口咬着一颗苹果，时不时还会站起来散个步。

第11天早上，是“五一”假期第一天。消防队员特意查了天气预报，这天要下雨，他们很担心雷电会击中位于高处的那个人。可是这次不必担心了，那天一大早，塔吊上的男人就健步如飞地下来了，带着自己的外套、雨衣和干粮，回到了地面。

难道这一次，他的诉求又成功了？现场有人说，是的，但这完全无从证实。人们得到确切答案之前，他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。不过这个答案也不算重要，消防车终于可以驶回驻地，沉默了11天的工地也得以复工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叮叮当地敲打着钢筋，而一度停滞的塔吊车，再度把建筑材料运上高空。

所以，如果你现在再路过北京的陶然亭，可再也不会见到住在塔吊上的人了。但不知道在其他角落，还有多少试图爬上塔吊的人，万一下次他又来了，人们又该怎么办呢？



5月4日，上海市虹口区新港路一老式居民楼因煤气爆炸发生倒塌，有人被困。一名郑姓女士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她急着去找被埋的丈夫。他们一家来自江西，在上海卖水果。 CFP供图

透析出来的丙肝

本报记者 王培莲文并摄

身高1.8米、体重220多斤的冯雪源要命也没想到，自己会患上尿毒症。他更没想到的是，在治疗尿毒症的过程中，又感染了丙肝。

那时，刚满20岁的冯雪源在吉林省东丰县的县城里当汽车修理工，每月能有2000多元的“体面”收入。

在被不期而至的尿毒症着实吓了一跳一阵子之后，他得知这种病可以通过透析和换肾治疗，顿时觉得人生又有了希望。“全家东挪西借总算凑够20多万元，本以为等到匹配的肾源就可以手术了。”冯雪源回忆，直到一位相识多年的医生告诉他，感染丙肝，是不能做换肾手术的。

“这次我真的完了。”冯雪源觉得就像掉入了黑暗的深渊，他的世界彻底暗淡下来。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冯雪源的10多个病友身上。被医院通知患上丙肝的时候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说“有这样一种病”。

那时的冯雪源相信，只要等到肾源，他就能重新过上“正常人的生活”

2009年7月，持续一个月高烧不退的冯雪源被查出患有尿毒症。按照医生的建议，他很快开始在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医院进行血液透析。

每隔两三天，冯雪源都会带着两根止血绷带，出现在东丰县医院透析室。

他回忆，刚做透析时，自己并没有做打长期战的准备。虽然每次透析，比牙签还粗的针头入手腕时，总会让他疼得“一哆嗦”，他却却没有像其他病友一样，在手腕内侧做用来减轻疼痛的“动静脉漏”。他盘算，做了“动静脉漏”会使胳膊的力气不如从前，如果半年内能换肾并康复，就没这个必要了。

每次透析时，第一针扎进腕部内侧的动脉上，用于引血，第二针则扎进肘窝处，作为进血口。两针头间由透析管路和透析机相连。

生病后，辞掉工作的冯雪源过着家与医院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。“就当休了个长假”，他想。那时的冯雪源相信，只要等到肾源，他就能重新过上“正常人的生活”。

冯雪源记得，透析半年多后的一天，时任透析室主任于大海告诉他，需要被分离到隔壁一间透析室，因为他得了丙肝。“没啥事，二三十年也不会发作。”于大海轻描淡写地说。

尽管如此，冯雪源在透析室外走廊的椅子上坐了1个小时才“缓过来”。事实上，在冯雪源被隔离前，已有10多名感染丙肝病毒的患者被转入另一间透析室。

比冯雪源更后知后觉的，还有现年54岁的于德胜、52岁的王淑淑和65岁的乔翠芹。“开始还以为有特殊照顾，和病友聊天才知道这一屋人都得了丙肝。”于德胜等3人回忆说，起初，医生并没告知他们需要分离出来的原因。

“一年多时间里，东丰县医院30多名透析患者中，有22人感染丙肝，其中1人为误诊。”于德胜回忆，此后再没听说有谁感染过丙肝。多名患者告诉本报记者，到今天，21名明确患有丙肝的尿毒症患者已有9人先后离世。

被分离到单独的透析室后，反应过来的丙肝患者质问病友，得到的答复是，“你本身就携带丙肝病毒”，或是“长时间透析

容易感染”。

当时，很多人相信于大海说的“二三十年不会发病”的话，买了些保肝药品，就没再做其他治疗。有些人则觉得，得了尿毒症已经没几年活头了，要是能活个二三十年，也算赚了。更有人说，按照甲、乙、丙的排序，丙肝在最后，应该是“最不要紧的病”。

她不想因为丙肝拖累丈夫，对方也没有再继续生活的想法，在感染丙肝后不久，于洪华和丈夫离了婚

一年多时间里，在同一医院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中，如此密集地相继感染丙肝，这让冯雪源等人开始怀疑：“不是因为医护人员操作不当，把大家都传上了”。

2005年就患有尿毒症的于洪华，曾在吉林省梅河口市的一家医院透析过两年。她记得，那家医院在给患者透析前，要对透析机进行半小时到40分钟的消毒。但在东丰县医院，“前面透析的人一下床，患者就换上自己的床单、铺上自己的被子，进行透析，没见过医护人员对透析机进行消毒”。

刚得知被感染时，于洪华每天都要去做透析，结束后去超市上班，下班后还能去学校接女儿。

未患丙肝前，虽然已被尿毒症折磨多年，于洪华并没觉得日子太难过。她在县城一家超市做售货员，每月有600多元的工资。早上，她从县郊的家里骑电动车去医院做透析，结束后去超市上班，下班后还能去学校接女儿。

丈夫则种了两晌玉米地，农闲时去县城打零工，家中虽有尿毒症患者，夫妻俩依然精心经营着三口之家。

这样的默契止于于洪华被医院告知感染了丙肝。

经常上网的于洪华查了丙肝的传播途径，血液、母婴和夫妻生活。她不想因为丙肝拖累丈夫，对方也没有再继续生活的想法，在感染丙肝后不久，于洪华和丈夫离了婚。

同命相连的还有28岁的梁雪莲。2010年患上尿毒症刚两个多月的梁雪莲，被通知感染了丙肝。丈夫知道后，决定离开县城到外地打工。“虽没离婚，婚姻已是名存实亡。”梁雪莲说，丈夫几乎不给她打电话，也不会往回寄钱。

没得丙肝前，梁雪莲曾一度认为自己“嫁对了人”。因尿毒症住院时，丈夫会把一日三餐买来送到她床边，还为她端屎倒尿。

虽然丈夫离开，于洪华和梁雪莲都感恩自己有个好女儿。

当记者提出要给于洪华母女合影时，12岁的小姑娘蹭地爬上炕，双手从后背搂住母亲的脖子，微笑着望向镜头。“我不怕被传染，我想把肾捐给妈妈，这样就能一直在一起了。”小姑娘笑呵呵地说。

“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，加之当时医疗设备条件有限，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”

即便四处“遭人嫌弃”，但大多数丙肝感染者回忆，因为“医盲”，几年来他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性。直到去年，看到其中一名病友临死前腹部肿大，他们才“真正害怕起来”。

在东丰县医院，69岁的李春贵是患尿毒症并染上丙肝的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。“他的肚子鼓得和排球一样，按上去像是装

了水的气球，可吓人了。”透析时碰到李春贵的冯雪源吓坏了。

2013年9月，10多名感染丙肝的尿毒症患者开始联合起来，找到东丰县医院负责人。他们提出，医院对他们感染丙肝负有责任，既然县医院没有专科门诊，医院就应带他们去省级医院进行检查，确定病情。

“医院没同意直接带我们去长春，而是采集每人的血液送到长春化验。但当我们索要化验结果时，院方不给，只是说我们都不严重。”多名患者告诉记者。

对此说法，东丰县医院院长江礼庭回应：“能那么干吗？那不是伤天害理嘛。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。”

于洪华回忆，2013年10月，东丰县医院又给感染者们做了彩超，结果显示“除别人有脂肪肝，其他人的肝、胆、脾和胰腺普遍正常”。很多人为此感到庆幸，但也有人怀疑县医院的结论，仍坚持要去长春的医院检查。

“想去可以，但医院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先签一份协议。”于洪华等人说。

2013年12月17日，13名患者分别与东丰县医院法定代表人江礼庭签署了名为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的协议。

在13份协议书中，共同的内容是：“当事人血液透析治疗时间较长，加之当时医疗设备条件有限，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。”“经调解，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由院方一次性赔偿患者医疗费人民币陆万元整；由院方免费为当事人每季度做一次肝功及病毒定量检测；患方获赠后，自愿放弃以此次治疗行为的其他权利主张。”

对于协议中“感染丙肝可能与院方有一定联系”的说法，江礼庭向本报记者解释说：“他们当时是不是在我们医院感染的丙肝还都不好说，可能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他举例说：“一个病人如果本身是丙肝携带者，由于当时设备有限，检测不出来，能说是我们医院传染的吗？”

江礼庭不否认的是，“五六年前，县医院的做法是，谁来了就给谁直接做透析，没有条件做化验。直到3年前，才能做到在为患者做透析前，检查其是否有传染类疾病”。

对于部分患者提出“透析机器曾不消毒，就让第二个人使用，而感染丙肝”的说法，江礼庭听后沉默片刻，低声说：“不应该是这样的。”

“一开始，大家都不愿签这份协议。”于

洪华等人说，但再一想，患病多年，家中早已家徒四壁，“6万元虽然不多，也是救命钱”。

就在签署协议的5天后，13名患者由东丰县医院出院、医护人员陪同，去往位于长春市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二部，进行了消化系统彩超和丙肝病毒测定等检查。

这次却得到了与两个月前东丰县医院大相径庭的检查结果。于洪华等多人的彩超结果显示“肝实质性转变”或是“肝硬化”，而梁雪莲等多人的丙肝病毒检测数据显示，病毒大量增加。

“当时就有4个人被留下住院了。”于洪华说。

现在，透析室搬到了县医院的另一栋楼，20多台透析机中，有4台为丙肝患者专用

当记者问起在该院透析的尿毒症患者为何集中感染丙肝时，时任东丰县透析室主任于大海拒绝予以回应。

院长江礼庭说，因为患者向他反映于大海把科室管理得混乱，患者感染丙肝一事常年不解决，今年年初已被免职，现在是院办公室的普通员工。

尽管于大海被免职，“透析室也比以前正规多了”，冯雪源等患者仍不愿再相信东丰县医院。

现在，透析室搬到了县医院的另一栋楼，20多台透析机中，有4台为丙肝患者专用。

苦于东丰县内没有其他医院可以透析，加之2012年该县开始享受国家给予尿毒症患者每年6万元治疗费用的政策，于洪华说，“我们只能继续在这儿透”。

在周围人眼中，同时患有尿毒症和丙肝，“那没救了”，于洪华却不愿这么想。

在“五一”前，她发动病友一起去县郊的山上野餐，“不想因为生病就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”。

席间，于洪华用今年花500元买的白色智能手机，给大家拍了照片，并把照片传到了QQ空间里。由于像素不高，26张聚餐照片大都模糊，却能看清许多露出七八颗牙齿的笑脸。

生病在家的冯雪源也没闲着。最近，朋友把破旧的轿车开到了冯雪源家院里，让他帮忙修理。

“我现在都不想未来会怎样，”冯雪源说，“只想活一天，就开开心心过一天。”



冯雪源在整理药箱

新闻眼

陈璇

抬杠

在天津蓟县西龙虎峪镇的一处风景区，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，源于一次环保举报。

举报的由头是村民发现有人在此地长年开采矿石。几天前，一位村民拨通了相关部门的举报电话。

他问：“南山有人开石头，你们管不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懒洋洋的声音：“南山，我跟他们说一声儿，他们综合执法的没在这儿啊。”

村民接着发问：“是镇里让开的不？”那位工作人员有些不耐烦了：“你咋这么废话，镇里谁让他开的。”

这边继续发问：“不是镇里让开的，为啥你们不管？”那一边也不甘示弱：“谁说不管啊，你刚举报？你咋不早举报，四五年前举报了不早就管了。你不举报不管。”

“我举报四五年了，你们也不管。”“七八年了，你咋不举报呢？”

就在俩人“兵来将挡水来土掩”的谈话间，开山的挖掘机轰隆隆地响着，写着“国家矿产，禁止非法开采”的石头桩子倒在碎石堆里。按照“不举报不管”或者“举报也不管”的逻辑，那些本该由监管者出马却缺位的职能，在执法者跟老百姓的一次次抬杠和推诿中，化成黏在电话筒上的口水，拿块儿抹布轻轻一擦，也就一干二净了。

如今，那个距离天津水源地不过3公里的风景区，曾经葱郁的青山被“开膛破肚”，连绵的山体裸露着灰白色的山石，粉尘乱飞。与此同时，当地政府每年要斥资10亿元来保护这个被称为天津“后花园”的地方。

打架

4月的一天，在接到媒体的污染举报后，河北邢台柏乡县的一支环保执法队伍出动了。

接下来的故事原本应该是，执法队员们“同仇敌忾”，查处污染企业。但情节却华丽地发生了逆转：执法队大队长的双腿还没迈入被举报的企业大门，却遭到中队队长飞来的一只横脚。于是，在冒着黑烟的烟囱前面，两个领导缠打在一起。当然，在不凑巧地成为这起“内斗”事件的现场后，那个污染企业终于难逃其咎。如此不小心撕破了面子，才看到了里子。据环保部“点名”的企业，在当地环保局的眼皮底下，长年擅自违规开工生产、偷排废气，直到两名队长在厂房门口打起来。

这不禁让人捏一把汗，如果不是柏乡县环保局自曝“家丑”，一个污染漏洞在松懈的执法管理下，仍有可能蒙混过关。当然，在不凑巧地成为这起“内斗”事件的现场后，那个污染企业终于难逃其咎。如此不小心撕破了面子，才看到了里子。据环保部“点名”的企业，在当地环保局的眼皮底下，长年擅自违规开工生产、偷排废气，直到两名队长在厂房门口打起来。

现在，透析室搬到了县医院的另一栋楼，20多台透析机中，有4台为丙肝患者专用。

苦于东丰县内没有其他医院可以透析，加之2012年该县开始享受国家给予尿毒症患者每年6万元治疗费用的政策，于洪华说，“我们只能继续在这儿透”。

在周围人眼中，同时患有尿毒症和丙肝，“那没救了”，于洪华却不愿这么想。

在“五一”前，她发动病友一起去县郊的山上野餐，“不想因为生病就让日子过得死气沉沉”。

席间，于洪华用今年花500元买的白色智能手机，给大家拍了照片，并把照片传到了QQ空间里。由于像素不高，26张聚餐照片大都模糊，却能看清许多露出七八颗牙齿的笑脸。

生病在家的冯雪源也没闲着。最近，朋友把破旧的轿车开到了冯雪源家院里，让他帮忙修理。

“我现在都不想未来会怎样，”冯雪源说，“只想活一天，就开开心心过一天。”

诈骗

为了拯救患尿毒症的儿子，陕西延安安塞县一个曾姓农民，选择了犯罪。摆在他面前的是数十万元的换肾手术费及医疗费，他只能四处举债。走到山穷水尽时，他摆住了一根危险的救命稻草——买假发票骗取新农合20多万元医疗费用，用在儿子的后期治疗上。

这免不了让人想起一位名叫廖丹的北京男人，为了救治重症的妻子也铤而走险，而且同样是因为尿毒症，使用的手段也相同。两年前，这个悲情的故事成为人们反思大病医保制度的一个痛点。

但相似的悲情并没有终结。在曹姓农民所在的村庄，还有另外3户家庭在陷入相同的困境时也走上诈骗。延安市的大病保险补助制度于2013年开始实施，而这些家庭都是从2011年开始遭遇厄运。这张社会保障网向更多人延伸的速度，没有赶上这几个农民挽救亲人的脚步。

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善因，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都应付代价。近日，涉嫌诈骗的曹某和他的同乡被法律审判。不过，这一次，人们感受到的更多不是罪恶得到惩戒的畅快，而是痛点再次被戳中的沉重。就像我们曾经悲叹廖丹的罪与罚，如今再次回到那个反思的原点——这个社会应有一个尽可能覆盖得宽广的兜底制度，让人们免于因病致贫的恐惧，从而选择善而不是恶的手段，去维护善的初衷。

谁也不想看到下一个廖丹，或者下一个曹某。